

# 岳麓秦简所见“徭”制问题分析 ——兼论“奴徭”和“吏徭”

朱德贵

(哈尔滨商业大学 经济史研究所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摘要:** 根据岳麓秦简《徭律》和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可知“徭”具有特定指向。秦“徭”制是指官府强制傅籍之“黔首”服劳役(或曰苦役)的制度,因而不能将“徭”与“徭役”、“力役”与“兵役”等概念混淆。秦简中尽管出现了“徒隶行徭(徭)课”、“舂城旦出徭(徭)者”和“行徭奴徭=役”等有关“徭(徭)”的史料,但这些史料并不能证明秦“徒隶”所服之“徭”为秦法律意义上之“徭”。秦简所见“居吏被使徭(徭)”等简文不是“吏徭”为秦法律意义上之“徭”的根据,“吏徭”也不是“职役”、“厮役”或“吏役”的代名词。秦“奴徭”和“吏徭”显然不是“徭”,这是因为,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理解,“奴徭”和“吏徭”皆不完全符合秦法律意义上之“徭”所必备的三个条件:一是傅籍之“黔首”身分;二是傅籍“黔首”由县廷下辖之列曹管理,尤其是“户曹”;三是傅籍“黔首”所服之“徭”为劳役(或曰苦役)。

**关键词:** 岳麓秦简 “徭”制; 奴徭; 吏徭

**中图分类号:** K87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6)04-0092-10

## Analysis of the Corvée Institution Recorded on the Yue Lu Bamboo Slips of the Qin Dynasty ——And “Slave Corvée” and “Official Corvée”

ZHU Degui

(Institute of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28,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rvée Law recorded on the Yue Lu bamboo slips of the Qin Dynasty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senior scholars, the “corvée” has a specific meaning. The “corvée” in the Qin Dynasty refers to the institution of the government’s forcing “the common people” of Fu Ji to work without pay. In no way can we confuse “corvée” with “compulsory Labor”, “doing physical work” and “conscript service”. The “corvée” appears in the bamboo slips of the Qin Dynasty and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but these historical data cannot prove that the Qin “slaves” service is the “corvée” of the legal meaning in the Qin Dynasty. “Official corvée” is not “corvée”. This is because both “slave corvée” and “official corvée” are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ree conditions of “corvée” stipulated in legal provisions. One is the identity of “the common people” of Fu Ji; the second is that people must be managed by many Cao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nty court, especially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ao; the third is that people must work without pay.

**Key words:** Yue Lu bamboo slips of the Qin Dynasty; corvée institution; slave corvée; official corvée

收稿日期: 2016-01-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碑刻文献与东汉官制研究”(13BZS019)、“简牍与战国土地制度研究”(14AZS003);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秦汉财政与社会控制研究”(14D070)

作者简介: 朱德贵(1964-),男,江西弋阳人,历史学博士,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 一、学术界对“徭”的不同理解

长期以来,秦汉“徭戍”制度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由于史料阙如,学界对秦“徭戍”的内涵及界定问题的研究仍未取得一致的认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傅筑夫等从传世文献出发,详细考察了秦汉徭役制度,他认为,“(秦汉徭役是)政府对人力的需求,主要不外两途:一为屯戍——兵役;二为力役——各种生产和非生产的劳动,如营建宫室、建立城郭、开凿河渠、修筑道路等等”。<sup>[1]</sup> (p229) 很显然,这种认识指出了秦汉“徭戍”制度的两个方面,但亦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秦兵役的范围问题。里耶秦简显示,秦兵役不仅包含屯戍,而且还有更戍、屯戍和冗戍等兵役形式;<sup>[2]</sup> (简8-149、简8-666 p89-98、197) 二是力役与劳役的理解问题。对此,黄今言指出,秦汉时期的力役当“包括劳役与兵役”。<sup>[3]</sup> (p246)

高敏从广义和狭义上对徭役进行了详细的解释。高先生云“秦汉的徭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徭役包括兵役在内,狭义的徭役则是除兵役之外的无偿劳役而言。因此,从广义的角度着眼,秦汉的兵役、徭役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秦汉都实行征兵制,凡符合年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因而往往同徭役征发混在一起,它不像募兵制下兵、徭的界限是比较清楚的。这是秦汉徭役的重大特征。”<sup>[4]</sup> (p126) 在此,高先生正确指出了秦汉徭役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徭”和“戍”(亦即劳役和兵役)。

从秦汉什伍编制、“徭”的征发对象、服“徭”者的期限和服役范围等方面来看,黄今言则给予了全面而系统之分析。<sup>[3]</sup> (p246-293) 其中,有关“徭”的征发对象和服役的方式等问题的研究结论,还得到岳麓秦简《徭律》的进一步佐证。

钱剑夫在《秦汉赋役制度考略》一书中将秦汉时期的徭役分为三种形式,即“更卒、正卒和戍卒”,也就是说,“更卒一月而更,戍卒则在边地,只有正卒即在内郡和京师……”<sup>[5]</sup> (p128、179) 然而,愚以为“戍卒”和“正卒”乃为一种制度的两个方面,此制度为秦简《戍律》中的戍役之制。

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马怡等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秦徭役制度分析的架构。他们认为,秦汉所谓“力役之征”应分为四项,亦即“劳役、屯戍、兵役和罚作”。其中,“劳役”指更卒之役和其它杂役,承担土木工程、转输漕运、官手工业作坊的生产和地方官府的供奉差使等;“罚作”指刑徒之役及谪戍、赏徭、居徭等惩罚性劳役。<sup>①</sup> 然而,“谪戍”能否归入“徭”? 笔者以为,此问题的解决尚待更多出土材料之支持。

21世纪以来,随着秦汉简牍材料的陆续刊布,秦汉徭制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杨振红的论断尤为新颖,即“更卒之役不是‘徭’”。杨振红认为,“‘徭’是国家承认的正式劳役”,且“‘更’役从本质上讲与‘徭’无关”。<sup>[6]</sup> 所谓“更卒”就是秦简中的“更戍卒”,如《新见里耶秦简牍资料选校(二)》载“更戍卒士五(伍)城父成里产,长七尺四寸,黑色,年卅一岁,族□ I 卅四年六月甲午朔甲辰,尉探迁陵守丞衙前,令□。 II 9-757”<sup>[7]</sup> (p197) 据此可知,“更卒”的全称应为“更戍卒”,但还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更卒显然是“戍役”中的一种形式;二是秦更卒除了履行军事职能外,还必须承担繁重的劳役。

我们知道,“封建城邦时代,国人服兵役者只限一家一丁之正卒,其子若弟并无兵役义务”,但是降至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逐步地扩大征兵,由国人而都邑,从国人到野人,最后达到举国皆兵”。<sup>[8]</sup> (p50) 战国时期,秦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兵农合一”之体制,“更戍卒”既是兵,更是务本之民。所以,秦傅籍之“黔首”既要服劳役(徭),也要服兵役(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彦辉最近又在《秦汉徭戍制度补论——兼与杨振红、广濂熏雄商榷》一文<sup>[9]</sup> 中系统探讨了秦“徭”制问题。该文主要围绕秦之徭与“一岁力役”的关系、徭与“委输传送”的关系和“繇使”与劳役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论述,很好地解决了秦汉“徭”制中的服役范围和“吏徭”问题。但他在分析“徭戍”概念时却说“‘徭戍’是秦汉时期法律文献中的固有概念,总体上体现了国家无偿役使民力的两大种类,其中,‘徭’指徭役,‘戍’指兵役。”<sup>[9]</sup> 其对“徭”概念之界定,笔者并不认同,因为前辈

① 参见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第16章“徭律”(马怡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58-494页。据此,屯戍、兵役作何理解? 难道兵役不包括屯戍? 另外,秦汉时期的“刑徒”是指服刑还是服役? 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学者早已界定清晰的“徭役”其实包含两个关键性概念——“徭(劳役)”和“戍(兵役)”<sup>[10]</sup>，“徭”并不等于“徭役”。因此，论者将“徭”和“徭役”混同，似为不妥。

孙闻博详细考证了秦及汉初之“徭”，以马怡等人的分析框架为基础，从秦汉徭役的广义和狭义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孙闻博的最大贡献在于清晰地区分了秦县级机构下辖之“诸官”与“列曹”，这使我们能准确地把握秦“徭”之类别、服役范围和管理方式等问题。然而，孙闻博却说，秦汉广义上之徭役就是指“劳役、屯戍、兵役和罚作”，其中对应“徭戍”中“徭”为“劳役”和“罚作”；“正役对应于狭义‘徭戍’，包括国家征发的一般性力役和屯戍一类常规性兵役”。<sup>[10]</sup>按照这样的理解，广义上之“徭戍”指的是“劳役、屯戍、兵役和罚作”；而狭义上之“徭戍”则为“国家征发的一般性力役和屯戍一类常规性兵役”。不难看出，此两者皆包含“劳役”和“兵役”，似无明显之区别。另一方面，不应将“力役”和“劳役”两个概念混同。在秦汉文献中，“力役”指的就是“徭戍”，既包括劳役，又包括兵役。<sup>①</sup>秦之“徭戍”(或“徭役”)制度不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它仅指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徭”，二是“戍”，亦即“劳役”和“兵役”。<sup>[11]</sup>

造成以上学者在秦“徭”制问题上长期聚讼不已的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在现有秦史资料的前提下，其主要原因是对秦“徭”的理解不同。

秦汉四百年，‘徭戍’之制不可能没有变化，我们不能仅依靠两汉的史料来推演秦制。正如陈松长所言，‘繇和役是单独使用的两个语义相近而又有区别的词语’，<sup>[11]</sup>我们绝不能将“徭役”和“徭”混同。那么，秦之“徭”有何特点？其内涵究竟如何？据许慎《说文解字》载“繇，随从也。从系繇声。”<sup>[12] (p270)</sup>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则详细解释说“繇，随从也。辵部曰：从、随行也。随、从也。繇与随、从三篆为转注。从系者、谓引之而往也。尔雅释故曰：繇、道也……道路及导引、古同作道，皆随从之义也。繇之讹体作繇，亦用为徭役字。徭役者、随从而为之者也。”<sup>[13] (p643)</sup>可见，许慎对“繇”的内涵作了本质的解释，而段玉裁之解释则掺杂了许多汉及汉以后之人对“徭”解读的思想。据此，陈松长解释说“繇既然是‘随从’，那么多少也是与劳作有关的，故汉以后的文献中，多将‘繇役’作为一个双音节的词语来使用。”<sup>[11]</sup>显然，陈先生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秦之“徭”指的就是“劳役”。所谓“劳役”者，《说文》曰“劳，剧也。从力，苙省。苙，火烧门，用力者劳。”<sup>[12] (p292)</sup>又，《淮南子·泰族训》云“无隐士，无犍民，无劳役，无冤刑，四海之内，莫不仰上之德。”<sup>[14] (p349)</sup>可见，“徭”指的就是官府强制傅籍之“黔首”服劳役之制度。

总之，我们在探讨秦“徭”制问题之前，首先应该依据可靠史料和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清晰界定“徭”之内涵，绝不能将“徭”与“徭役”、“力役”与“兵役”等概念混淆。近年来，随着秦简的陆续披露，出现了一些有关“奴徭”和“吏徭”的史料，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奴徭”和“吏徭”也是“徭”。难道“奴徭”和“吏徭”果真是秦法律意义上之“徭”吗？可喜的是，岳麓秦简《徭律》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 二、岳麓秦简《徭律》的内容和性质

秦《徭律》与徭制有着必然的联系，《徭律》是构成秦徭制的基础。首先，我们从秦简《徭律》入手，详细考察秦徭制的具体内容及其实质。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两批有关秦《徭律》的简文，一是云梦秦简之《徭律》；二是新近披露的岳麓秦简之《徭律》。尤其是岳麓秦简所载之史料在某些方面填补了秦“徭”制史研究的史料空白，为我们重新审视秦的徭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请看岳麓秦简中《徭律》的如下简文：

繇(徭)律曰：岁兴繇(徭)徒，人为三尺券一，书其厚焉。节(即)发繇(徭)，乡嗇夫必身

① 张金光先生认为，秦之“徭戍”应该“分‘徭(更)’役与‘戍’役(兵役)两大类。秦律各分专篇以规定其事。睡虎地秦简即有《徭律》和《戍律》”，亦即黄今吾先生所言的“劳役和兵役”。参见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陈松长公布的一枚简文进一步印证了秦文献中“徭戍”一词常连用的文书惯例，如“繇戍自□日以上尽券书及署于牒。”(岳麓秦简《徭律》简1305)参见陈松长《睡虎地秦简中的“将阳”小考》，《湖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因此，老一辈学者有关秦汉徭役制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秦汉“徭役”和“力役”等概念的界定不宜轻易否认。

与典以券行之。田时先行富(简1241)有贤人,以闲时行贫者,皆月券书其行月及所为日数,而署其都发及县请(情)。其当行而病及不存(简1242)署于券,后有繇(徭)而聂(蹶)行之。(简1363)

……遣归葬。告县,县令给日。繇(徭)发,亲父母、泰父母、妻子死,遣归葬。已葬,辄聂(蹶)以平其繇(徭)。(简1238)<sup>①</sup>

上引岳麓秦简材料是秦《徭律》之一部分。这几枚简文至少反映了秦徭制的如下历史真相:

1. “兴繇(徭)”必须建立严格的“徭徒”档案。材料表明,秦《徭律》规定了官府制作“兴繇(徭)”档案文书的情况,其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岁兴繇(徭)徒,人为三尺券一(符),书其厚焉”。所谓“三尺券一(符)”就是指“对文书形制上的规定”,<sup>[15]</sup>而非“叁辨券”之讹误<sup>②</sup>。“书其厚焉”中的“厚”,确实是指“徭徒”家庭“财物多少”之情况,<sup>[16]</sup>如《汉书》卷四九《晁错传》:“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sup>[17]</sup>据此,愚以为秦“兴徭”文书的制作以年度为期,并将每位“徭徒”的家庭财产情况登记在“三尺券一(符)”上。我们还可进一步推测,此“兴繇(徭)”文书还当包含“徭徒”的姓名、籍贯、身高(或年龄)等内容。

那么,秦《繇(徭)律》何以要特别规定“徭徒”的家庭财产情况和官府的签署意见呢?这是因为,秦官府为了不误农时,其在《徭律》中特别规定了“田时先行富有贤人,以闲时行贫者,皆月券书其行月及所为日数,而署其都发及县请”。其实这句话应包含两层意思:

其一,依据《徭律》之规定,秦“兴徭”的对象为编户之人,亦即《徭律》中的“繇(徭)徒”。<sup>[4]</sup>秦汉时期“有身便有赋,有丁则可役”,<sup>[3]</sup>徭役征发的对象“大都是贫苦的劳动者”,“地主不过数家”。<sup>[3]</sup>可见,黄今言先生在此正确指出,只有著籍“黔首”才是“行徭”的对象,但简文显示,秦时不论贫富,一律“行徭”,且“田时先行富有贤人,以闲时行贫者”。<sup>[8]</sup>

当然,秦汉官府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或群体制定了严格的“复除”制度,“给公家徭役”<sup>[17]</sup>者随着利益集团的强大而愈加稀少,如武帝时期“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sup>[18]</sup>黄今言将这种“复免徭役”之对象归为如下几类:一曰“宗室署籍及诸侯、功臣的后代”;二曰“凡有官籍,俸给六百石至二千石官吏和都尉以上的军官”;三曰“享有一定爵位者”;四曰“博士弟子,甚至能通一经的儒生”;五曰“民有车骑马以及入奴婢者、入粟者”。<sup>[3]</sup>因此,“复除”人数愈多,为政府“给役使”<sup>[17]</sup>者就减少。在此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秦“复除”人员也有专门的登记文书,请看如下秦简之记载:

廿八年五月己亥朔甲寅,都乡守敬感言之:□ I

得虎,当复者六人,人一牒,署复□于□ II

从事,敢言之。□ III 8-170

五月甲寅旦,佐宣行廷。8-170 背<sup>[2]</sup>

不难看出,秦“复除”人员必须“人一牒”,由官府详细记录在案,以备相关官吏查询“徭徒”服役的情况。至于上引简文中的“牒”,《说文》曰“牒,札也。”又,《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右师不敢对,受牒而退。”<sup>[19]</sup>据此,卜宪群说“牒书广泛用于验问、责问,用于名籍登录、官吏升迁任免,也可用作法律文书、财物管理公文等。牒书可用于下行文书,也可用于平行、上行文书。”<sup>[20]</sup>很显然,“牒书”除了卜先生所云之功能外,还可用于“复除”文书的制作,因此,上引湘西里耶秦简加深了我们对秦“牒书”内容的了解。除此以外,“逋事”及“乏繇(徭)”者也应记录在案,如云梦秦简载:

可(何)谓“逋事”及“乏繇(徭)”?律所谓者,当繇(徭),吏、典已令之,即亡弗会,为“逋事”;已阅及敦(屯)车食若行到繇(徭)所乃亡,皆为“乏繇(徭)”(简164)。(《法律答

① 参见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149-150页。在写作本文时,作者依据的史料为陈松长先生在《秦汉时期的繇与徭使》一文中的几则《徭律》。可喜的是,《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之出版,其中7条《徭律》皆证明本文的观点是成立的。

② 陈松长以为,此处之“三尺券”实为云梦秦简中的“叁辨券”。参见陈松长《岳麓秦简中的〈徭律〉例说》,《出土文献研究》第11辑,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64页。愚以为,此种解释恐误。

问》》<sup>[21] (p132)</sup>

覆 敢告某县主:男子某辞曰“士五(伍),居某县某里,去亡。”可定名事里,所坐论云可(何),可(何)罪赦。(简13)【或】覆问毋(无)有,几籍亡,亡及逋事各几可(何)日,遣识者当腾,腾皆为报,敢告主。(简14)。(《封诊式》)<sup>[21] (p150)</sup>

根据《法律答问》简164可以看出,秦律对“逋事”和“乏繇(徭)”的适用范围作了详细之规定。“逋事”就是指官府在兴徭时,“徭徒”不服从命令,“亡弗会”;而“乏繇(徭)”则是指“徭徒”已接受检阅并享用官府所廩之粮食,或已抵达服役地点,但“乃亡”者。毋庸置疑,官府为了了解这些“逋事”和“乏繇(徭)”者的情况,显然制作了专门登记“徭徒”服役情况的档案文书,否则官府如何知晓“徭徒”之“几籍亡,亡及逋事各几可(何)日”呢?上引《封诊式》简14还反映了各级官府对“徭徒”之“逋事”的上报制度,亦即“遣识者当腾,腾皆为报,敢告主”,这一情况正好和例1中的“署其都发及县请”相一致。

其二,“富有贤人”先行“徭”,“贫者”则次之。何谓“贤人”?《说文》曰“贤,多才也。从贝叡声。”此处之“多才”显然为“多财”之意,正如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所说“贤,多财也。财各本作才。今正。贤本多财之偶。引伸之凡多皆曰贤。人称贤能,因习其引伸之义而废其本义矣。”可见,岳麓秦简《徭律》对“行徭”作出了详细规定,农忙时节富人先行徭役,而农闲时则征发“贫者”服役。这是当时为政者推崇的“使民以时”思想的体现,如《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云“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颜师古注曰:“……爱养其民,无夺农时。”<sup>[17] (p1123)</sup>

(2) 档案中必须登记“徭徒”服役的月份和天数,并由各管理部门负责签署。例1中“皆月券书其行月及所为日数,而署其都发及县请”即可为证。所谓“月券书其行月及所为日数”,指的就是秦“月为更卒”之“日数”。

2. 岳麓秦简《徭律》对“徭徒”服役期间的特别规定。岳麓秦简《徭律》对“徭徒”服役期间回家奔丧者在法律上有特别之规定:“……遣归葬。告县,县令给日。繇(徭)发,亲父母、泰父母、妻子死,遣归葬。已葬,辄(蹶)以平其繇(徭)。”<sup>[16] (简1238 p164)</sup>很明显,这是一条有关“徭徒”在服役期间“遣归葬”的法律条文,大致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服役所在地的官吏要发文给“徭徒”户籍所在的县廷,命令“给日”,亦即给予“徭徒”回家赴丧的假期;二是规定了准予丧假假期的范围,即只有“徭徒”之“亲父母、泰父母、妻子死”,才可以“遣归葬”;三是赴丧假期结束后,“徭徒”必须“辄(蹶)以平其繇(徭)”。

3. 岳麓秦简《徭律》与云梦秦简《徭律》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云梦秦简《徭律》主要针对各级徭役征发官吏的责任、工程保养、苑囿修缮、农田保护和工程估算等与“徭”有关内容之法律规定。<sup>[21] (简115-简124 p47)</sup>具体来讲主要包括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对官吏征发劳役期限的规定;对司空等官吏所承建工程担保的规定;对县级机构所负责的禁苑和苑囿修缮的规定;对苑囿附近农田的保护;对拆除、修缮和扩建官有房屋的规定;对工程量估算的规定。不难看出,秦之“徭”与“劳役”密切相关,而与《戍律》中所记戍卒之劳作截然不同,它其实就是傅籍“黔首”所服之“徭”。傅籍“黔首”所服之“徭”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具备傅籍“黔首”的资格;二是由各级行政机构中的诸曹管理,其中“户曹”的管理职能尤为关键;三是傅籍之“黔首”所服之“徭”为劳役(或曰苦役)。

前引岳麓秦简《徭律》对官府“兴繇(徭)”作了如下规定:建立“徭徒”档案,“人为三尺券一(符)”;对富人和贫者“兴徭”及其日期的规定;对回家治丧者补回欠缺徭期的规定;规定了“徭徒”的管理机构。由此可以看出,岳麓秦简《徭律》或为秦《徭律》之一部分。而且,云梦秦简《徭律》与岳麓秦简《徭律》也有必然的联系:这两部《徭律》都属于“劳役”,而非“戍役”;且都强调对服役日期的规定。如岳麓秦简中有“皆月券书其行月及所为日数,而署其都发及县请”的法律规定。云梦秦简则对负责官吏“兴徭”的日期、保养和修缮期限以及“徭徒”服役期限的减免等内容给予了详细的规定。

概而言之,根据岳麓秦简《徭律》、云梦秦简《徭律》和里耶秦简等史料所反映的历史真相及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愚以为,秦法律意义上之“徭”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服“徭”者必须是著籍之“黔首”;第二,服“徭”者由各级县乡行政机构统一管理,尤其是县级诸曹;第三,服“徭”者主要从事修筑河津道桥、委输漕运、修筑宫苑城池和修筑陵寝等劳役(或曰苦役)。<sup>[3] (p281-292)</sup>

### 三、“奴徭”和“吏徭”不是“徭”

秦简中出现的“奴徭”和“吏徭”，是秦法律意义上之“徭”吗？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孙闻博的观点。<sup>[10]</sup>孙先生云“徭”包括“‘奴徭’、‘吏徭’等人身役使，特别对‘小’年龄群体的役使，较后代突出。”为此，论者提出了如下几条关键性证据：

1. 仓课志：A I

畜彘雌狗产子课，A II

畜彘雌狗死亡课，A III

徒隶死亡课，A IV

徒隶产子课，A V

作务产钱课，B I

徒隶行繇(徭)课，B II

畜鴈死亡课，B III

畜鴈产子课，B IV

• 凡□ C(8-495) <sup>[2] (p169)</sup>

2. ……

• 小城旦九人：F I

其一人付少内。F II

六人付田官。F III

一人捕羽：强。F IV

一人与吏上计。F V

• 小春五人。F VI

其三人付田官。F VII

一人徒养：姊。VIII

一人病：□。F IX

□□囙敢言之，写上，敢言之。ノ座手。8-145 背 <sup>[2] (p85-86)</sup>

3. 行繇奴繇 = 役(简 1590) <sup>[22] (p142)</sup>

4. 城旦舂衣赤衣，冒赤巾幘(𡇗)，拘桎櫜杖之。仗城旦勿将司；其名将司者，将司之。舂城旦出繇(徭)者，毋敢之市及留舍闕外；当行市中者，(简 147) 回，勿行(简 148)。(《司空》) <sup>[21] (p53)</sup>

例1、例3和例4是有关徒隶行“繇(徭)”的事例，而例2则是一份有关分配刑徒工作的簿书。很明显，例1、例3和例4简文中虽然出现了“徒隶行繇(徭)课”、“舂城旦出繇(徭)者”和“行繇奴繇 = 役”等记载，但我们不能仅凭简文中出现的“繇(徭)”之字词，就断然认定其为“徭”。根据上文引述《说文》之解释，“繇(徭)”的基本含义就是“随从”，然此“繇(徭)”有三点必须注意：一是“繇(徭)”者的身分；二是“繇(徭)”者的上级主管部门；三是“繇(徭)”者劳作的范围。<sup>①</sup>

第一，“徒隶”的身分不是著籍之编户民，其所服劳役不是法律意义上之“徭”，而是“服刑”。简文中的“行繇(徭)”和“出繇(徭)”等只不过是按秦《徭律》之规定来管理罪犯“徒隶”劳作的方式而已。再看如下秦简：

① 学术界对秦“徒隶”问题有过详细之探讨，如李力《论“徒隶”的身份——从新出土里耶秦简入手》，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3-42页；高震寰《从〈里耶秦简〉(壹)“作徒簿”管窥秦代刑徒制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二辑)，第132-143页；贾丽英《里耶秦简所见徒隶身份及监管官署》，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一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8-81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山里耶秦简之徒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二辑)，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101-131页；沈刚《〈里耶秦简〉(壹)所见作徒管理问题探讨》，《史学月刊》2015年第2期。

廿七年(前220)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段(假)卒史谷、属尉:令曰“传送委,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货赎责(债),急事不可留,乃兴繇(徭)。”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当传者多,节传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货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田时殴(也),不欲兴黔首。嘉、谷、尉各谨案所部县卒、徒隶、居货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簿,有可令传甲兵,县弗令传之而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当坐者言名决泰守府,嘉、谷、尉在所县上书嘉、谷、尉,令人日夜端行。它如律令。<sup>[23] (p143)</sup>

据此可知,对于“传送委”这种繁重的劳役工作,“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货赎责(债)”,而在农忙时节,为了保障农业生产,秦法还特别规定了“不欲兴黔首”。若有违反此令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因此,兴“徒隶”与兴“黔首”是明显不同的。

秦简还显示,“徒隶”中的“隶臣妾”的户籍由各级“徒隶”管理部门掌控,待其服役期满后,户籍必须返回原籍,如秦律规定“隶臣欲以人丁粼者二人赎,许之。其老当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隶妾欲以丁粼者一人赎,许之。赎(简61)者皆以男子,以其赎为隶臣。女子操败红及服者,不得赎。边县者,复数其县。(简62)”(《仓律》)<sup>[21] (p335)</sup> 此处虽只谈到了有关隶臣妾“赎”的问题,但最后一句“复数其县”至关重要,它是指“隶臣妾”的户籍由服役所在地管理,事后才能返回原籍。

另外,“徒隶”中的“隶臣妾”也必须依律“傅籍”,如“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以十月益食”(《仓律》)<sup>[21] (p333)</sup>。但“隶臣妾”并非全是刑徒,只有当“隶臣妾”触犯了法律,且为法律“耐为隶臣”和“当刑隶臣”之时,才能称为“刑徒”。<sup>[24]</sup> 研究表明,这种傅籍之“隶臣妾”显然不具备立户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秦“隶臣妾”并非编户民。<sup>[25]</sup>

第二,“徒隶”主要由县廷所辖之诸“官”管理,而著籍之编户民则由县廷之列曹负责。上引秦“仓课志”中记录了“徒隶”行徭、作务和牲畜等情况,其中“课”指的是考核,如许慎《说文解字》云“课,试也。”<sup>[12] (p52)</sup> 又,《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课校人畜计。”<sup>[18] (p2892)</sup> 据此,李均明在《里耶秦简“计录”与“课志”解》一文中解释说“‘课’侧重主观认识,而‘志’包含主观判断的字义相关,两相对应,颇显和谐。”<sup>[26] (p157)</sup> 李先生的此种解释是很有见地的。那么,秦“仓”之下的“徒隶”事务又是如何管理的?秦简显示,“仓”属县廷诸“官”之一,“秦代地方徒隶主要由司空、仓管理。其中,司空主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货赎责(债),而仓主要管理徒隶中的隶臣妾”。<sup>[10]</sup> 不可否认,秦县廷列曹和诸官是有严格区分的,当时“以长吏理事之县廷为中心,从内、外的角度来看,列曹处内,无印绶,多称‘廷○曹’,与令、丞关系更密切;诸官在外,有印绶,未见称‘廷○官’者,具有更多独立性”。<sup>[27]</sup> 可见,“徒隶”主要由诸官中的司空、仓、船官、田官、廐、畜官、库等管理。而著籍之“黔首”则主要由列曹管理,请看湘西里耶秦简的如下记载:

卅五年九月丁亥朔乙卯,貳春乡守辨敢言 I 之:上不更以下繇(徭)计二牒。敢言之。 II  
(8-1539)

……之入□。五□ I

□□□□千三百八十三日 繇(徭)二日,员三万□ II

□凡五万六千六百八十四日□ III (8-1615)

上引材料就反映了秦县廷“户曹”对“繇(徭)计”的管理情况,正如王彦辉所说,简8-1539和简8-1615中的“繇(徭)计”属“户曹计录”中的“乡户计”。<sup>[9]</sup> 同时,这也进一步说明,秦著籍之“黔首”的“繇(徭)计”是由基层行政单位“乡”负责制作和统计的。

第三,徒隶“行繇(徭)”或“出繇(徭)”,主要是按徒隶所属官府按工作的类别分配各种不同的劳役(或曰苦役)。那么,此“繇(徭)”者劳作的范围究竟如何?其实,我们只需了解一下秦县廷下辖之诸官中“徒隶”劳作的情况即可。

其一,从事田作等方面的工作,主要由“田官”负责。简文中有“田官徒簿(簿)”,如“廿九年尽 I 岁田官徒簿(簿) II 廷。 III”(8-16)<sup>[2] (p31)</sup> 此处的“田官徒簿(簿)”即是指田官管辖“徒隶”之劳作簿,如“(隶臣妾)廿四人付田官(8-145)”、“(小隶妾)六人付田官(8-444)”、“(小城旦)六人付田官(8-145)”、“(小春)其三人付田官(8-145)”和“(小城旦)其八人付田官(8-162)”。<sup>[2] (p99)</sup> 田官所辖“徒

隶”劳作的情况主要以“计”簿的形式出现,如“田官计(8-481)”,其工作绩效的考课也有专门之簿籍,名曰“田官课志(8-479)”。

其二,从事畜牧业有关的劳作,主要由畜官负责。简文中常见“畜官作徒薄(簿)”,如“畜官、I 田官作徒薄(簿) □ 及贰春Ⅲ廿八年Ⅳ(8-285)”。<sup>[2] 1(p128)</sup>有关“徒隶”从事畜牧业的劳作情况也有记载,如“(隶臣妾) 其二人付畜官(8-145)”、“(□寇) □作圜, □畜官(8-162)”。畜官“作徒薄(簿)”对徒隶所饲养的牛、羊和马等牲畜皆记录在案,简文称之为“畜官牛计, BⅣ 马计, CⅠ 羊计 CⅡ(8-481)”。<sup>[2] 1(p164)</sup>同时,在“畜官课志(8-490)”下特别设置了“徒隶牲畜死负、剥卖课(8-490)”和“徒隶牲畜畜死不请课(8-490)”<sup>[2] 1(p168)</sup>两项考课内容。

其三,从事“仓”有关的工作,主要由诸官中的“仓”负责。如“二月辛未,都乡守舍徒薄(簿) □ I 受仓隶妾三人(8-142 背)”、“受仓隶妾七人(8-145)”、“受仓隶妾二人 □ (8-179)”、“受仓隶妾三人 □ (8-688)”、“受仓隶妾一人 □ (8-963)”、“受仓隶臣一人(8-973)”、“受仓隶 □ (8-991)”、“受仓大隶妾三人(8-1278)”、“受仓小隶臣二人(8-1713)”、“受仓小隶臣二人(8-1713)”、“受仓大隶妾三人(8-1759)”。这些典型例子说明秦“仓”主要管理“隶臣妾”,并向其他机构派出“隶妾”或“隶臣”。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简文关于“仓”所管理“徒隶”的记载中均不见“耐隶臣妾”、“刑隶臣妾”、“系隶臣妾”、“城旦舂”和“鬼薪白粲”等因触犯法律而沦为刑徒(或曰罪犯)的情况。这种现象进一步说明,“隶臣妾”与“城旦舂”和“鬼薪白粲”等刑徒分属不同部门,其身分也定当有所不同<sup>①</sup>。毋庸置疑,诸官中之“仓”也有考课记录,亦即“仓课志”,其下设有“畜彘雌狗产子课”、“畜彘雌狗死亡课”、“徒隶死亡课”、“徒隶产子课”、“作务产钱课”、“徒隶行繇(徭)课”、“畜鴈死亡课”和“畜鴈产子课”(8-495)。当然,诸官中还有“司空、船官、廐、库”等机构,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拟进一步申论。

除了以上所论“徒隶”劳作之范围外,秦“徒隶”还从事宫苑陵墓建设和道桥修筑等艰苦的劳役工作。至于十五岁以上且未傅籍之“黔首”以及“皖老”的服役情况,学界已有研究,<sup>[6]</sup>此不赘述。

概而言之,秦“徒隶”尽管所服之役为劳役(或曰苦役),但其不具备著籍“黔首”之身分,因此秦“徒隶”所服之役不是“徭”,而是服刑。

接下来,我们再来简略分析一下秦“吏徭”的两个问题。一是秦“吏徭”能称之为“服役”吗?如孙闻博指出“秦及西汉,吏在基本职事之外,常被官府差使从事各种外出工作。这在当时也称‘徭’,‘行徭’一称,或反映了‘徭’多受差使而外出服役的特征。”<sup>[10]</sup>二是秦“吏徭”是否能指代“职役”或“厮役”?如王彦辉说“就吏员的本职与公差来说,低级吏员的本职就包括‘徭使’在内,这个‘徭’或许称之为‘职役’‘厮役’更为恰当。”对此,我们不禁要问:秦时“吏徭”指代的究竟是“服役”、“职役”、“厮役”,还是“履职”?先请看如下湘西里耶秦简之简文:

卅四年正月丁卯朔辛未,迁陵守丞郢敢言之:迁陵黔首 □ I

佐均史佐日有泰(大)抵已备归,居吏被使繇(徭)及 □ II

前后书,至今未得其代,居吏少,不足以给事 □ III

吏。谒报,署主吏发。敢言之。IV

二月丙申朔庚戌,迁陵守丞郢敢言之:写上 □ V

旦,令佐信行。 □ (正) VI 8-197

① 马怡先生认为,“隶臣妾”是一种贱民身分的称呼。(马怡《秦人傅籍标准试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笔者专门撰文探讨了秦“隶臣妾”问题,结果发现“秦‘隶臣妾’应分为两种:第一种为依附于官府名下之‘隶臣妾’,这种‘隶臣妾’又分为具有行动自由且通过‘从事公’或经营产业而获得经济收入之‘隶臣妾’和因触犯法律而被处‘以为隶臣妾’者;第二种为依附于私人名下之‘隶臣妾’,他们只有获得户主放免后,才能拥有立户和财产支配权。”参见朱德贵《岳麓秦简所见“隶臣妾”问题新证》,《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沈刚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沈先生认为“仓掌握的徒主要有隶臣、隶妾、大隶臣、大隶妾、小隶臣,也就是说隶臣妾都由仓来管理。司空掌握的刑徒主要有隶妾系春、城旦、丈城旦、舂、司空居贲、居贲、赎责、鬼薪、白粲、小城旦、隶妾居贲、小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隶妾本是归属仓管理的,但如果受到居贲的处罚,则要划归司空管理。”(沈刚《〈里耶秦简〉(壹)所见作徒管理问题探讨》,《史学月刊》2015年第2期)因此,愚以为,秦“徒隶”应分为两种类型——“刑徒(或曰罪犯)”和“隶臣妾”。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全面把握秦“徒隶”研究中的诸多问题。由此而言,马怡先生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



报别减。I

正月辛未旦,居赏枳寿陵左行。□Ⅱ8-197 背<sup>[2](p108-109)]</sup>

很显然,这是“迁陵守丞郢”所发出的一份上行文书,其中有“居吏被使繇(徭)”的记载。孙闻博据此认为,这份文书“内容实际涉及吏徭”,“地方官府役使而外出服各种供奉、差使类杂役”。<sup>[10]</sup>但是,笔者认为,陈松长对秦“吏徭”的研究结论是正确的,陈先生云:“……(秦汉时期)官吏的‘繇使’也许就如现在各级行政管理人员出‘公差’,它并不是一种劳役或苦役,而只是一份差事而已。”<sup>[11]</sup>

不可否认,王彦辉在《秦汉徭戍制度补论——兼与杨振红、廣濂熏雄商榷》一文中正确界定了“吏徭”的性质:“官吏的‘徭’与百姓的‘徭’”绝不能“混为一谈”。<sup>[9]</sup>然而,王先生却又将东汉之“职役”、“厮役”与秦之“吏徭”相混淆,这就略显不妥了。如王先生在文中列举了两条佐证材料:一为《后汉书·独行列传》中之“职役”,此乃陈述东汉和帝时期之事儿<sup>[28](卷八十一 p2685)]</sup>;二是《后汉纪·孝灵皇帝纪》中的“(陈寔)少为县吏,常给厮役”之史料。<sup>[29](p454)]</sup>

我们知道,“吏”的本意就是指“治人者也”<sup>[12](p7)]</sup>。在官僚制度初创之秦时,“吏”的工作就是治理百姓事务,而不是所谓的“职役”或“厮役”。但东汉后期,尤其是汉末以后,由于基层“吏”逐渐卑微化,其工作也为世人所鄙视,故此时“充吏”可称之为“吏役”、“职役”或“厮役”<sup>①</sup>。之所以有如此之说,著名史学家唐长孺先生给出了正确的解释:

“吏的解释就是官,《说文》‘吏,治人者也。’那怕最低层的吏,本来也都不是役。中央和地方机构中有吏,军中也有吏,我们在史籍中经常见到‘吏士’或‘吏兵’联称,通常即泛指将士。但是由于低层的吏常被长官驱使奔走,加以职务的繁重,某些劳役又加在他们头上,充吏就逐渐演变为一种吏役,有时还成为别于编户的特殊户口。这种情况大致始于汉末,成于魏晋,而南北朝时期最为显著。”<sup>[30]</sup>

事实就是如此,秦官吏之工作可以称之为“履职”,但绝不能界定为“职役”、“厮役”或“吏役”。

总之,秦法律意义上之“徭”必须满足上文所提三个条件。试问“高祖常繇咸阳”,难道我们就能说高祖刘邦是去咸阳服苦役吗?此类例子在汉初张家山汉简中还有很多,如“相国、御史请关外人官、为吏若繇(徭)使、有事关中”<sup>[31](简500 p313)]</sup>、“今廷史申繇(徭)使而后来,非廷尉当”<sup>[31](简190 p374)]</sup>等,这些事例无不说明,秦及汉初官吏“繇(徭)使”只不过是一种履职的行为而已。

## 四、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岳麓秦简《徭律》为我们正确理解秦“徭”制中的服役者身份、管理部门和服役范围等问题提供了新的依据。可以说,这些新史料填补了秦“徭”制研究的史料空白。

据岳麓秦简《徭律》和前辈研究之成果,秦“徭”制指的就是官府强制傅籍之“黔首”服劳役(或曰苦役)的制度。“徭”与“徭役”不同,这是因为秦“徭役”既包含“徭(劳役)”,又具有“戍(兵役)”的意义。同时,“力役”与“兵役”两个概念也不容混淆,“力役”相当于“徭役”或“徭戍”,它是劳役与兵役的合称。

岳麓秦简《徭律》等出土材料揭示,秦法律意义上之“徭”应具备三个要素:一是服“徭”者必须为傅籍之“黔首”;二是此类服“徭”者由县廷列曹管理,其中“户曹”尤为关键;三是服“徭”者从事的官府分派的各种艰苦的劳役(或曰苦役)。我们知道,秦简中虽然出现了“徒隶行繇(徭)课”、“舂城旦出繇(徭)者”和“行繇奴繇=役”等记载,但这些材料只能说明,秦官府根据《徭律》的法律规定来管理“徒隶”劳作而已。因此,不应认定“奴徭”为秦法律意义上之“徭”。根据秦“徭”应具备的三个条件及前贤研究的成果,“吏徭”也不应归入秦法律意义上之“徭”,因为官吏不是服苦役,而是“履职”。

(本文承蒙恩师黄今言先生指正,谨致谢忱!)

<sup>①</sup> 这种情况在长沙走马楼吴简中屡见,具体参见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杨振红《吴简中的吏、吏民与汉魏时期官、吏的分野》,《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黎虎《“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 参考文献:

- [1]傅筑夫.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上):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2]陈伟主编. 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 [3]黄今吾. 秦汉赋役制度研究[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8.
- [4]高敏. 秦汉的徭役制度[A]. 秦汉史探讨[C].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5]钱剑夫. 秦汉赋役制度考略[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 [6]杨振红. 徭、成为秦汉正卒基本义务说——更卒之役不是“徭”[J]. 中华文史论丛, 2010(1).
- [7]里耶秦简整理小组. 新见里耶秦简牍资料选校(二)[J].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编. 简帛(第10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8]杜正胜. 编户齐民: 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0.
- [9]王彦辉. 秦汉徭戍制度补论——兼与杨振红、广瀨熏雄商榷[J]. 史学月刊, 2015(10).
- [10]孙闻博. 秦及汉初“徭”的内涵与组织管理——兼论“月为更卒”的性质[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5(5).
- [11]陈松长. 秦汉时期的繇与繇使[J]. 湖南大学学报, 2014(4).
- [12]许慎. 说文解字(附检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13]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14]高诱注. 淮南子[A]. 国学整理社. 诸子集成(七)[Z].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15]陈伟. 岳麓书院秦简《徭律》的几个问题[J]. 文物, 2014(9).
- [16]陈松长. 岳麓秦简中的《徭律》例说[J]. 出土文献研究(第11辑), 上海: 中西书局, 2012.
- [17]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18]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9]杜预注. 孔颖达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A].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20]卜宪群. 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J]. 历史研究, 1997(4).
- [2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 睡虎地秦墓竹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 [22]朱汉民. 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壹)[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 [23]马怡. 里耶秦简选校[J].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编委会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24]朱德贵. 岳麓秦简所见“隶臣妾”问题新证[J]. 社会科学, 2016(1).
- [25]朱德贵, 庄小霞.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所见西汉“奴婢廩食出入簿”问题探讨[J]. 中国农史, 2015(5).
- [26]李均明. 里耶秦简“计录”与“课志”解[J].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编. 简帛(第8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27]孙闻博. 秦县的列曹与诸官——从《洪范五行传》一则佚文说起[OB/OL]. 简帛网, 2014-09-17.
- [28]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29]袁弘. 后汉纪·孝灵皇帝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30]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役[J]. 江汉论坛, 1988(8).
- [31]彭浩, 陈伟, (日)工藤元男. 二年律令与奏谏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责任编辑: 戴利朝)